

Defending Lu Xun: Debates on “Lu Xun Styl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u Xun’s Image in Shanghai

Gang GUO

Abstract: In Shanghai, the isolated island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Lu Xun was taken as a valuable spiritual resource and consequently exploited by 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Initially, the essayists harbored the intention of seeking the leadership of united front by means of commemorating Lu Xun and championing Lu Xun’s writing style but all to no avail. Eventually, the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 split, the peace movement launched by the puppet regime of Wang Jingwei in Shanghai sowed dissention among the literati. The argument between the leftists, centrists and the rightist broke out and last into the 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Initially, the Wang’s puppet regime hoped to project the image of Lu Xun as “a goodwill friend” for Japan. However, the literati under the Wang’s regime reverted the mythicized Lu Xun to the normal Lu Xun. Japan, however, intended to reconstructed the modern literature of Shanghai by means of “returning to Lu Xun and starting afresh” so as to make Shanghai’s literati cooperate in the “Great East Asia War”. But this attempt failed. The construction of Lu Xun did not end until Shanghai was completely occupied. The continuous reviews of Lu Xun carried out by China Daily displayed the whole process of reverting a mythicized Lu Xun to a normal Lu Xun. This process was a spectacle of constructing Lu Xun and worthy of studying by students of Lu Xun.

Key words: Lu Xun, Isolated island, “Lu Xun style” essay

Author: Guo Gang received his Ph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2015. He is currently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is recent research field includes culture and litera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the press in modern China.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Isolated Island at Shanghai* was awarded as university excellent doctoral dissertation.



保衛魯迅：“魯迅風”論戰與孤島魯迅之型塑^①

郭剛

[摘要] 抗戰時期的上海孤島，作為精神資源的魯迅，為各派政治勢力所利用，在紀念聲中，各取所需。最初是“魯迅風”雜文作者群，在紀念魯迅和提倡雜文中含有對統一戰線領導權的爭奪意圖，但結果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分化。汪偽和平運動抵達上海後，文化界出現左派、國民黨系、日汪系三方混戰的格局，並延續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汪偽系統最初是希望將魯迅塑造為“日本友人”的親善形象，但廁身其中的文化人卻將被左翼神話了的魯迅還原為人間魯迅。日本方面希望借“回到魯迅再出發”來重建上海的現代文學，進而“協力”大東亞戰爭，但頗為受挫。孤島魯迅的型塑，至上海完全淪陷後才完結，通過『中華日報』持續的紀念，最終是聖人魯迅回到人間魯迅，這一魯迅形塑史上的奇觀，值得魯迅研究諸家品味。

[關鍵詞] 魯迅 上海孤島 “魯迅風”雜文

[作者簡介] 郭剛，2015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獲博士學位，現為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目前研究領域在抗戰時期的文化和文學，中國近現代以來的報刊。博士學位論文『上海孤島時期的文學翻譯』獲校優秀博士論文。

^①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22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視域下的左聯文論及其資料整理與研究(22ZD&281)』階段性成果，同時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專家的寶貴意見及對論文做出的貢獻。

前言

1939年元旦，困居孤島的許廣平出席了上海藝人新年同樂會。^①這場具有統一戰綫性質的聯誼會因突發的一段小插曲而耐人尋味。組織方在聯誼會現場突然撤下原先懸掛的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和魯迅的四偉人像，而再次懸掛時僅剩孫蔣二人，毛澤東和魯迅的畫像則不見了蹤跡。这一幕頗令魯迅遺孀不滿，以至許廣平借郁達夫的悼文表達憤慨——“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②此处的旧話重提並非是要強調孤島各界對已逝魯迅的“不知擁護愛戴和崇仰”，而是要指明在身處孤島上海的特殊語境中，各方人士尤其是統一戰綫內部在看待魯迅和“繼承魯迅精神”時出現的認知困境。表面上，這是1938年孤島“魯迅風”論戰的某種延續，但深層原因則是魯迅身後評價分歧之表現，尤其是在孤島抗日統一戰綫陣營內部如何評價魯迅和認識魯迅雜文的時代性與局限性，如何看待“內部鬥爭”，如何開展“大眾化”文藝抗戰等等問題的突出反映。目前關於“魯迅風”論戰的觀察僅停留在參與者的回憶中，僅有現象和細節層面的記述，同時缺乏對“魯迅風”雜文批評方阿英、龐樸、楊晉豪等回應文章的客觀評價，致使基本史實尚有待澄清，遑論從具體的孤島語境和整個抗戰大局出發進行歷史的回顧和評價。有鑒於此，將“魯迅風”論戰重置於孤島語境，還原“魯迅風”雜文群的形成過程並對論戰所涉“魯迅”話題進行總結和分析，就很必要，也惟有以此為基礎，才能更進一步揭示孤島各方力量如何對魯迅形象進行塑造，及愛國知識份子在“保衛魯迅”過程中進行的文化鬥爭。

一 “第二魯迅”與“魯迅風”雜文群的形成

魯迅逝世後，各類紀念文章數量繁多甚難計數。不過從傾向上看，“擁魯”文章數量佔比相當大，但“非魯”文章亦不能忽略，除蘇雪林的“刀筆文化”^③外，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還是『東南日報』和『大公報』的短評。批評或集中在“尖酸刻薄的筆調”給青年以“不良影響”，“取容青年，流毒不淺”；或“一味嘲罵，於事無補”^④的非建設性批評。“擁魯”論調則主要有以下三類：（一）魯迅生前好友許壽裳、蔡元培等，偏重文學成就、思想和學術貢獻；（二）延安方面和國防文學派強調民族鬥士、統一戰綫維護者和“蘇聯之友”的左翼形象，（三）魯迅“身邊人”胡風、蕭軍等則偏重“反抗意識”、“國際主義精神”等等。在旗幟鮮明的擁魯和非魯之外，國民政府官方則基本保持緘默。這一點在戰前籌備『魯迅全集』出版過程本已有明顯表現，如對魯迅30年代的雜文的大加削刪。國民黨官方的緘默到1939年10月魯迅逝世三周年時才被打破。^⑤在陪都重慶，由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中國文藝社等十三個團體籌組的紀念大會上，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潘公展和中國文藝社的主幹王平陵均對魯迅作了積極正面評價，王平陵強調了魯迅的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一面，^⑥落腳點在不妥協的戰鬥精神和反投降反汪上。潘公展則強調魯迅是從喚起民族意識的角度進行文藝宣傳，但落腳點還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反宗派反割據”的政治立場，其針對性也是明顯的。^⑦其實此種立場也好理解，1936年救國會利用魯迅出殯時的“逼蔣抗日”，1937年魯迅逝世周年紀念時的“鞏固統一戰綫論”，都不免讓國民政府當局感到一定的政治壓力。

① 「上海藝人新年同樂會」，『文獻』2，5（1939）：71-73；另見『大晚報·剪影』1939-01-20。

② 景宋：「偉大的人」，『譯報·大家談』1939-01-22，第4版。

③ 參見蘇雪林：「過去文壇病態的檢討」，『文藝』（武漢）「民族文藝專號」4，1（1937）：6-13。

④ 見『大公報』（上海1936年10月20日）「悼魯迅先生」和『東南日報』1936年10月22-26日「蓋棺論定的魯迅」。『東南日報』前身為『民國日報』杭州版，為浙江省黨部機關報，改組後人員班底未變，其對具有鄉誼關係的魯迅之態度，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⑤ 中國文藝社負責人之一的徐仲年在1938年10月16日，也即魯迅逝世二周年時發表「重讀吶喊與彷徨」，雖然徐仲年身份是文協中人，但其中國文藝社的背景，讓這篇文章顯得非常特殊，但需要注意的是，文章本身並不具有代言官方的色彩。重慶亦有魯迅逝世二周年紀念大會，且『中央日報』副刊『平明』也配合刊發魯迅逝世二周年紀念特刊，但並未有官方人物撰文，似乎也難以代表官方態度。

⑥ 平陵：「怎樣紀念魯迅先生？」，『魯迅逝世三周年紀念專輯』（1939）：1。

⑦ 潘公展：「紀念魯迅先生的意義」，『文藝月刊』3（1939）：268-270。

魯迅早就預言過身後事，“即使在中國還有追悼的可能，也千萬不要給我開追悼會或者出什麼紀念冊。因為這不過是活人的講演或挽聯的鬥法場，為了造語驚人，對仗工穩起見，有些文豪們是簡直不恤於胡說八道的。”^①確如魯迅所預言，舉凡各種魯迅紀念的大會和文章，在“招牌主義”的喧囂中，“魯迅”不斷被“強制闡釋”。這其中最明顯的莫過魯迅雜文的遭際。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全面實行戰時動員體制，1938年『戰時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實行後，新聞出版管控趨於嚴苛，1939年正式發動包括淪陷區在內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確立“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最高原則，在“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和“紛歧錯雜之思想必須糾正”的政治語境中，鮮明體現魯迅批判精神和反抗意志的雜文在需要“凝聚意志”的大後方顯得不合時宜，這也難怪有論者發出“中國的文壇上，雜文是死掉了”的感歎。^②但情況亦有不同，在戰時的上海孤島就出現了一個以“魯迅風”相號召的同人團體並引發一場近乎是延安魯迅精神討論預演式的論爭。

“魯迅風”雜文群雖活躍於戰時上海，但鬆散的集結卻早在戰前的『立報·言林』出現，具體包括了王任叔、唐弢、柯靈、周木齋、周黎庵、孔另境、文載道等，即後來被趙景深描述為“七子”的浙東雜文家。^③他們雖以繼承“魯迅精神”相號召，但首腦王任叔與魯迅生前並無交往，只因中共上海文委和復社的關係參與了『魯迅全集』的勘校工作才與魯迅有了瓜葛。除了王任叔在1938年恢復組織關係成為黨員外，餘下幾位均無黨派，故而大致可將這個群體視為鄉誼和『言林』言論陣地投稿者的聚合。需要說明的是，『立報·言林』是一個獨立而帶有清議色彩的副刊，去世後的魯迅是該刊的一個重要話題。此外，傳統文人落拓不羈，狷介不群的精神氣質也是這個群體的特徵。王任叔曾自言“喜歡插科打諢的人，一味正經實在有點不配”。^④孔另境則性情耿介，敢於直言，戰前曾因“文壇盟主”^⑤問題與阿英、郭沫若等筆墨交鋒。孔另境對魯迅是由感恩到服膺，魯迅逝世後連載在『立報』寫作「讀魯迅劄記」20篇；柯靈長期浸染滬上游藝界和小報界，對於魯迅，並不拘於“民族魂”等標籤，而是側重其不妥協的戰鬥精神和熱愛光明熱愛人類的精神特質。周黎庵和文載道服膺於魯迅的“肉搏”，傾倒於所謂魯迅的“考古癖”，多從“掉書袋”式的史跡闡發來結構文章，突出的思維特徵是“立異”。唐弢更不必提，長於模仿魯迅幾近亂真。因此，從精神氣質、同鄉之誼到共同的寫作陣地來看，這個以“學習魯迅”相號召的雜文群確有幾分結社性質。不過，王任叔在孤島上海之所以高舉魯迅大旗，除了校勘『魯迅全集』過程中所受的“感召”外，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郭沫若提出的一個議題。

1937年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座談會上，郭沫若提出“造出第二個魯迅出來”。他說：

我們應該一方面追懷導師，它的路，努力的方向，不屈不撓的向前做去，完成他的未完成的工作，紀念魯迅，使每個人都成為魯迅，魯迅先生，可以說從古以來就沒有第二個魯迅了，要人人成為魯迅，這話未免誇大，覺得是不量力的……**學習魯迅有一個方法，集多數人的力量，造成一個魯迅，用集體創作的的方法，造出第二個魯迅出來。**^⑥

郭沫若的所謂“第二魯迅”的說法雖在『救亡日報』上有簡要記錄，但更詳細的披露出現在曹聚仁和陳靈犀編輯的『社會日報』副刊『火線』上。郭沫若提供的“用集體創作的的方法”來學習魯迅，這一新穎的提法不但得到與會者陳望道、黎烈文認可，亦有王任叔的附議。但“集體創作”具體是指當時風起雲湧的報告文學還是魯迅的代表文體“雜文”，郭沫若則未有進一步說明。如果聯繫王任叔在孤島時期獲得的“活魯迅”^⑦美譽及其文學實踐來看，王任叔無疑是以提

① 魯迅：「病後雜談」，『且介亭雜文』（上海：上海三間書屋，1937），第172頁。

② 1938年10月18日『時事新報·文座』發表蕭蔓若的「對於魯迅的打擊」，稱雜文家的消失是對魯迅的真正的打擊。延安的雜文創作興起是到了1941-1942年，而大後方的雜文復興是在1940年，如桂林創刊的夏衍、宋雲彬等編輯的『野草』月刊，但刊物並非嚴格意義的雜文月刊，而是散文雜文戲劇翻譯研究性論文等並存的文藝綜合月刊，且編者之一的宋雲彬明確有魯迅雜文“不能模仿，不必模仿，不可模仿”的論述。見『魯迅雜文研究提綱』，『中學生』32（1940）：8-11。

③ 趙景深：「記柯靈」，『世界』半月刊1，3（1946）：43。另見周黎庵，「談雜文」，『眾生』2，6（1939）：202-203。

④ 巴人：「開場白」，『譯報週刊』1卷6期，1938-11-16。

⑤ 相關文獻見『大晚報·火炬』，『立報·言林』，孔另境：『秋窗集』（上海：泰山出版社，1937）等。

⑥ 韓光：「魯迅逝世周年座談會記詳」，『社會日報·火線』1937-10-22、23。

⑦ 轉引自薑振昌「魯迅風的活力與活魯迅的風範—孤島雜文概觀」，『山東社會科學』6（1989）：66-72。

倡並身體力行“魯迅式”雜文的方式繼承和學習魯迅精神的。問題是，郭沫若提出的“集體創作的方法”如何理解，這很容易引導我們去聯想孤島時期出現的大型報告文學作品『上海一日』。應該說，這也確實符合戰前左翼知識份子提倡的“集體創作方式”，但王任叔顯然是取了另一路徑，即以他為中心，引導、團結和形成一個“魯迅雜文”創作群體，他是以此方式響應了“第二魯迅”的議題。

若回到孤島歷史現場就會發現，儘管有王任叔的主觀願望，但滬戰結束後兩個多月裡，新聞出版業的停頓，各大日報晚報的停刊或縮版遲滯了王任叔“第二魯迅”的文學實踐。1938年2月11日『文匯報』的創刊帶來了轉變的契機。『文匯報』打著“英商”旗號創刊，有著原先『大公報』的資金和班底，版式和字體也與『大公報』無異，儼然給人以『大公報』復活的遐想。學界一般認為『文匯報』有民間資本和商業經營的屬性，但實際並不單純。『文匯報』的重要成員包括“京滬杭甬兩路局”的遣散人員，其中有國民黨兩路局黨部的嚴寶禮，國民黨耄宿胡惠生，國民黨中宣部駐滬專員室的費彝民，編輯人員儲玉坤等也都是國民黨黨員，即便副刊『世紀風』的編輯柯靈，戰時身份也是顧祝同所轄東南戰區宣傳員，其他重要人員如胡雄飛、徐恥痕、范煙橋等也是持中間立場的報界老人，故而從組成人員看，並無左翼。如此一來，『文匯報』之於國民黨方面在政治立場上無疑是可靠的。但柯靈編輯的『世紀風』之所以能容納王任叔、唐弢等左翼知識份子，一方面由於孤島初期左翼知識份子數量佔優，此外別無倚重；另一方面是鄉誼和私人關係，總之就是王任叔所說的編者柯靈的所謂“拉”^①。但也並非沒有掩護，如王任叔的第一篇雜文便署名若水，此筆名係首次使用。而唐弢在『世紀風』露面，也是換了將離、橫眉等一套筆名，周木齋同樣也用了全新筆名辯微。由此，從1938年2月11日始，『世紀風』上每天少則一篇多則數篇四五百字的雜文面世。『世紀風』出現後，類似的版面設置迅速蔓延到『大美晚報晨刊·早茶』、『每日譯報·燭火』、『每日譯報·大家談』、『導報·晨鐘』、『大晚報·街頭』、『華美晨報·閒話今日』以及『譯報週刊』、『華美週刊』等。當然，此時的描述尚屬事後推導。事實上，在幾乎整個孤島時期，雜文都是各個副刊的必備文體，寫作者眾多，風格也不限於“魯迅風”式雜文，還有當時流行報端的“時評”式雜文，如惲逸群就化名亭長、君宜寫有大量二百字左右的“小言”式雜文，多從輿論中心的國際時政、孤島民生等話題切入，風格簡潔明快鞭辟入裡。但這種“小言”式雜文與“魯迅風”式雜文並無承繼關係，而是沿襲了清末民初陳冷血在『時報』所設的「時評」的風格。此風格流行於二三十年代，孤島時期亦作者眾多，除惲逸群外，于伶、范泉、張若谷、朱生豪、胡山源等都從事過此類寫作。若要在“魯迅風”雜文與小言式短評間做出區分，除了判斷群體，更重要的是要從寫作模式上分析。這方面，王任叔曾概括的“魯迅風”雜文具有的所謂“五反”（反日、反漢奸、反托、反法西、甚至於反封建）^②特徵，僅專注內容，實有欠說服力，而孔另境歸納的運用“暗示”達到“政治和社會的諷刺”的“文藝雜感”^③也只是蹈襲了瞿秋白對魯迅雜文的定性。更貼切地描述來自趙景深，他將“魯迅風”雜文的文體風格概括為“文句上很像魯迅”^④。確也如此，“魯迅風”雜文群的整體風格是以字句特徵、文章寫法和思維方式為標誌的。當然，思想內容也有一定程度的近似。概言之，“魯迅風”雜文群是以王任叔、唐弢、文載道、周黎庵、柯靈、周木齋、孔另境等先依託『文匯報·世紀風』，後倚重『魯迅風』半月刊，以繼承“魯迅精神”或創造“第二魯迅”為號召，通過學習和模仿魯迅雜文而形成的作者群。^⑤

① 王任叔：「關於邊鼓集」，『橫眉集』（上海：世界書局，1939），第78頁。

② 屈軼：「邊鼓集·弁言」，『邊鼓集』（上海：文匯有限公司，1938），第3頁。

③ 孔另境：「論文藝雜感」，『橫眉集』（上海：世界書局，1939），第8頁。

④ 鄒嘯：「記浙東的雜文家」，『宇宙風』108（1940）：397-398。

⑤ 孔另境曾言『魯迅風』半月刊幾乎收不到外稿。

二 “魯迅風” 論戰

1938年10月發生了所謂“魯迅風”論戰。按照當事人王任叔描述，“魯迅風”論戰的開端是阿英在自己編輯的『譯報·大家談』上的一篇紀念魯迅逝世二周年的短文「守成與發展」。針對流行報端的“魯迅風”式雜文，阿英認為“如果魯迅不死”，他會“隨著抗戰的進展，開拓了新的路”，“決不會再像在過去禁例森嚴時期所寫的那樣迂迴曲折，情緒上，也將充滿著勝利的歡喜”。阿英所說的“新的路”即“韌性戰鬥的精神，勝利的信念配合著一種巴爾底山的，突擊的新形式，明快，直接，鋒刀，適合著目前的需要”。^①阿英並不反對雜文本身，而是期待那種創作情緒上樂觀，寫法上明快直接而非迂迴曲折的新雜感的出現。如果批評至此，還不至引發爭論，不過阿英舉出的反面例子恰是王任叔在1938年9月『文匯報·世紀風』上的系列文章『捫虱談』，1938年6月在『譯報·燭火』上的五篇「無花的薔薇」及1938年10月在『申報·自由談』的三篇「抽思」。阿英的批評立即招來王任叔的反擊，王任叔一面條件反射般地撇清並否認受魯迅影響，一面承認文章“不夠明朗與潑辣”，最後指出阿英的批評是“個人的嫌隙”，大概即滬上小報所謂的王任叔出走『譯報』係人事糾紛所致。^②轉過天去，阿英隨即回應了王任叔，指出問題的中心並非“個人的嫌隙”，而是下述的四點意見：

- 1 目前文壇上模仿魯迅風氣是不是甚盛！
- 2 這樣傾向的增長對發展前途是不是有害！
- 3 如果有害，我們是不是應該表示抗議！以及更基本的：
- 4 如果魯迅還在，是不是依舊寫這樣的雜文？（這可以用他在軍閥時期所寫雜文不同於後來所寫的作證）。^③

此處需要注意到是第2、3、4點，阿英用了相當肯定的語氣認為“這樣傾向的增長對發展前途有害”。阿英對雜文的評論，恐怕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判斷。魯迅逝世後，文壇即出現“雜文時代將過去”的流行論調。如徐懋庸就斷言：

到了現在，魯迅式的雜文，在刊物上漸漸的減少了。這減少的原因，不單在於作者的稀少——本來做慣這種雜文的作者，近來也少做了——，卻在於社會現實的激變。原來那種自我中心，個人筆調的雜文，作為戰鬥的武器，是只適於思想的啟蒙期，用以遊擊似的破壞舊物的。但一到**新思想已經確立的時候，與舊勢力的戰鬥到了集體化的戰鬥的時候**，則這種只是對準細微的一點而諷刺的小品文，就欠有力。這時為讀者所需要的，是作正面的指導的，以集體為中心的，成為體系的論文了。^④

徐懋庸的結論是“集團性”的“速寫”和“報告文學”將取代雜感成為統一戰線時期的新文體。不過，阿英也並非單純複述徐懋庸的判斷，因為阿英呼喚的是“適合著目前需要”的新雜感。若聯繫革命文學論戰中著名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的言論，阿英對文學的“時代性”特徵要求可謂是一貫的。但囿於孤島統一戰線內的多數意見，作為民族抗爭旗幟的魯迅和戰鬥工具的雜文並不容被輕易取代，故而阿英還是對雜文的戰鬥工具的作用予以了肯定。^⑤事實上不止阿英，在統一戰線內部，也可能對魯迅雜文是否適應抗戰新形勢，心存疑慮。

阿英與王任叔的交鋒僅僅兩個回合，隨後王任叔的文章雖仍有含沙射影，但已不算爭論。接下來便是論戰的第二階段。緣起是『文匯報』頭版刊登自家印行的文藝叢刊『邊鼓集』廣告。這篇可能出自柯靈之手的廣告使用了頗多引起爭議的詞句，如小標題「一年來雜文代表作的總

① 鷹隼：「守成與發展」，『譯報·大家談』1938-10-19。

② 巴人：「有人在這裡」，『申報·自由談』1938-10-20。

③ 鷹隼：「題外的文章」，『譯報·大家談』1938-10-21。

④ 徐懋庸：「小品文的新趨勢」，『通俗文化』4，9（1936）：18-21。

⑤ 阿英此時對魯迅雜文的認識是否受到延安方面的影響，尚難確定。1937年10月，毛澤東在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週年上闡釋了魯迅精神，隨後演說詞被整理發表在1938年3月的『七月』第10期，僅僅兩個月後，此文傳入孤島，轉載於『新語』周刊1卷5期（1938年5月20日），阿英隨即注意到此文並在其主編的『文獻』月刊1卷2期（1938年11月10日）轉載。阿英也許注意到，毛澤東的魯迅論，根本沒有提及雜文，而是將魯迅精神概括為政治遠見，鬥爭精神，犧牲精神，這種弱化學影響而突出政治意識的全新作家論，是否讓阿英更有底气提出“這樣傾向的增長對發展前途有害”的質問呢，尚難確定。

集」，“收穫最豐富，成績最可觀的，即是一般所謂‘魯迅風’的雜文。……在文藝價值和社會價值上，都有著最高的成就。……可作為中學生文學進修的最好讀本”。^①誇張的用語原是廣告的慣用手法，但由於統一戰線內各方心存芥蒂，迅速招致龐樸^②在『華美晨報·鍍金城』上發文質疑其“抹殺其餘，涉嫌壟斷”抗戰文藝，且“魯迅風”雜文“在寫作不自由的掩護下”採用“旁敲側擊”、“轉彎抹角”的方式“賣弄文才，簡潔到像古文”，採取“抄古書，出冷門”的方式讓大眾“看不懂”。這種從文藝“大眾化”角度的批評與阿英是相似的，不同之處在於龐樸將“魯迅風”作家尤其是王任叔等定義為“結成幫口”“把持文壇”，^③這裡雖然沒有觸及統一戰線領導權問題，但立即招致『文匯報』組織了兩期雜文特刊予以回擊。對於龐樸的過火指責，王任叔等的回應亦不冷靜，甚至夾有謾罵和人身攻擊。對此，龐樸採取“圍剿總答覆”的方式做了一一回應，特別是提出現階段的文學與現階段的抗日的直接關係，認為創作時候尤其應注意三點意見：“內容夠真實嗎？意識夠正確嗎？文字夠清楚明白嗎？”^④期間，在于伶接編阿英的『譯報·大家談』上，也發表了楊晉豪呼籲“大眾化”的「寫給誰看？」一文，可以看成是對龐樸的呼應。^⑤從輿論界在整個論戰期間的反應來看，『社會日報』發表「紀念魯迅」一文也有相似批評：“單是浮面的學習那些用字造句，那是膚淺的。”^⑥『大晚報』發表的「關於魯迅風」也支持阿英的觀點，同時呼籲停止論爭。^⑦響應『大晚報』的，還是楊晉豪，他不但再次強調了“大眾化”立場，而且呼籲“諸位作著論戰的朋友（只要不是漢奸），面談一下，不要再在報上作意氣之爭了吧”。^⑧楊文發表後第二天，時任中共地下黨文委書記化名孫一洲的孫洽方也撰文呼籲停止“意氣之爭”，同時提出“魯迅雜文的重新估價”的問題。^⑨面對結束紛爭的要求，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上海文藝協會”在12月4日召集關係方交換意見。^⑩會談的結論是一篇有著38人簽名，且同時在『譯報』『譯報週刊』『文匯報』『大晚報』『華美晨報』『大英夜報』公開發表的「我們對於魯迅風雜文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據參與者的先後回憶，召集人為『譯報』總編輯錢納水。當然，此時的錢納水除了『譯報』總編輯外，還有一個身份是上海文藝協會秘書長，即孤島初期統一戰線的召集人，一個近乎是文協老舍般的角色。^⑪如此看來，座談會實質是統一戰線內部以解決人事糾紛的方式去為魯迅雜文和“魯迅風”雜文定性。「意見」首先亮明了統一戰線的前提是反日反漢奸，接著措辭謹慎地肯定了魯迅風格和魯迅雜文的意義，但話鋒一轉，談到問題實質：學習魯迅“應該學他那種戰鬥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學習他的面對著現實，不斷地向黑暗勢力作戰的奮鬥精神，才能把握到真正的魯迅”，接下來批評道：“如果只捧住魯迅的全部著作，而忘記了時代環境，不只是學不到魯迅，而且有害。”在談到“魯迅風”雜文時表示，“現代的雜文作者受其影響，而寫成魯迅風的雜文，這並不是壞傾向。但壞的卻是刻意模仿魯迅。這樣做，會遭失敗，因為魯迅的風格有他自己的特殊性，而刻意模仿者已首先失掉自己固有的個性了”。顯然，這裡給王任叔等人定性為“失掉自己固有的個性”的魯迅雜文的“刻意模仿者”，同時也強調展開自我批判時，“批評者與被批評者的態度都要真摯而嚴肅”，最後再次強調“反日反漢奸”的當前任務：“尤其是在集中一切力量來抗敵救國的現

① 『文匯報』1938-11-17。

② 盧豫東據王任叔「四年來上海文藝」一文得出龐樸即曾迭（周壬林）。但筆者認為亦可能是『鍍金城』編輯吳漢。吳漢原是CC系潘公展『新夜報』編輯，後加入CC系為主幹的中國文藝協會。

③ 龐樸：「風雨雜奏四：論魯迅風」上下，『華美晨報·鍍金城』1938-11-21、25。

④ 龐樸：「圍剿的總答覆」，『華美晨報·鍍金城』1938-12-4、5、6、8、10、11、15、18。

⑤ 楊晉豪：「寫給誰看？」，『譯報·大家談』1938-11-22。

⑥ 大素：「紀念魯迅」，『社會日報』1938-10-22。

⑦ 巨川、莫思、棲樺、葉蒂：「關於魯迅風」，『大晚報』1938-11-28。盧豫東在「巴人與魯迅風論戰」中指認，巨川係李一，莫思係毛羽，棲樺係朱曼華，葉蒂係徐懷沙。

⑧ 楊晉豪：「論批評家的眼睛並答各家」，『文匯報·世紀風』1938-12-1。

⑨ 孫一洲：「向上海文藝界呼籲」，『譯報週刊』1，9（1938）：230-231。

⑩ 座談會的大致話題按照王任叔的回顧，大致六點，具體參考巴人『論魯迅的雜文』，第104-112頁。

⑪ 一般回憶文章只提錢納水為『譯報』總編輯，而不提其上海文藝協會秘書長的身份，由此就導致無法看清座談會的目的，即出於解決人事糾紛，統一認識。但該協會在不同人的筆下名稱也有不同，如李秋生稱之為抗日文化協會，見「上海孤島報業奮鬥史」，『傳記文學』（台灣）46，4（1984）：73-76。

在，我們更須避免虛費精力和時間，多作一點與國家民族有益的工作”。^①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意見」一方面抽象肯定魯迅和魯迅雜文，另一方面又給王任叔等人戴上“刻意模仿魯迅”的帽子，從創作規律和藝術個性的角度否定了他們的雜文創作。^②

需要說明的是，這份結論性「意見」因有論爭雙方38人^③的集體簽名，理應視為統一戰線內部的共識。但論戰後王任叔並沒有放棄自己的觀點。後魯迅風雜文的批評者楊晉豪、《華美晨報·鍍金城》編輯吳漢落水，也有謠言說錢納水被日偽綁架後附逆。^④這被王任叔用來證明自己當初關於魯迅風雜文意見的正確，從而使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對該論戰的評價倒向一邊。但事實上無論是錢納水，還是楊晉豪，他們在孤島時期都屬於統一戰線內非左翼的報人兼理論家，其立場和態度不宜因附逆與否而被全盤否定。何況即便在共產黨內，對待“魯迅風”雜文的意見也並不一致。論爭一方的阿英且不提，黨內留守孤島的重要幹部中持反方立場的還有楊帆、林淡秋和戴平萬，^⑤而惲逸群編輯的《大美報·早茶》則至少三次刊發或譏諷或質疑的文章，甚至接替阿英主持《譯報·大家談》的于伶也刊發了楊晉豪的質疑文章。可以進一步佐證這一結論的，就是孤島文藝運動在論戰後偏重了文藝通訊員運動和戲劇運動，雜文讓渡了“前哨”^⑥地位，這似乎也是黨內對“魯迅風”雜文持保留態度的另一種表現。

三 “意識”問題和「副刊指導意見」

針對座談會達成的所謂「意見」，鼓吹魯迅風雜文的一方並沒有放棄自己的理念，稍後即有《魯迅風》面世，似給人“賭氣”的印象。甚至在論戰半個世紀之後的當事人回憶中，情緒的憤激也是顯而易見的，^⑦這種論斷影響甚至左右了此後的孤島文學研究。但這種停留在“意氣用事”或“漢奸文人”、“頑固派”、“打倒魯迅為的是抬高自己”的論調並無益於我們今天進入歷史現場。其實從座談會召開的時機、組織者和聲明來看，孤島文化界當時確是希望以解決人事糾紛的方式來結束論戰，雖在抽象地繼承魯迅戰鬥精神方面達成了一致，但爭執的關鍵問題並未真正解決。那麼，這場論戰的實質何在？我們依舊需要回到最初的「意見」中，其中關於魯迅雜文，有如此評價：

他的雜文，或曲折幽默，或明快活潑，有理論也有感情，似銳利的匕首，命中地刺在阻礙民族國家社會進步的一切敵人的胸膛裡，完成了最偉大的社會作用。正因為他的**曲折幽默明快潑辣的二種不同的風格**，使他的雜文更有戰鬥的力量，更明顯地表現出他的革命性，積極性。^⑧

用“曲折幽默”和“明快潑辣”來概況魯迅雜文的風格無疑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但這並非執筆者的“不專業”所致，相反，這篇意見斟酌了三週以上的時間才出爐。若推敲“曲折幽默”和“明快潑辣”兩個並不妥帖的用詞則會發現，二詞其實指代了孤島當時流行的兩種雜文形式。“曲折幽默”是指代王任叔為代表的“魯迅風”雜文，而“明快潑辣”則指各大報紙且不限於文藝版面上出現的各種“時評”。就像前文所言，“時評”是二百字上下的“小言”，多針對國內時政、戰況和國際事件，可視為報紙“社論”的“小樣”，篇幅雖小但“明快潑辣”確是其一貫風格。這類文體初被陳冷血採用，後常被各大日報採用，在孤島報壇流行也很自然，座談會上的反對魯迅風雜文的一方即希望用這類短評取代“魯迅風”雜文。但在王任叔看來，這類短評

① 「我們對於魯迅風雜文問題的意見」，《華美晨報》1938-12-28。

② 王任叔於論戰後的1940年撰文表示其在座談會上作了關於魯迅雜文的報告，雙方發表意見後但並無結論。見巴人，《論魯迅的雜文》（上海：遠東書店，1940），第9-10頁。

③ 不同報紙的簽名人數略有差異，人名略有不同，總體在36-38人之間。

④ 錢納水被日偽綁架後不久被營救，隨即轉至後方。錢納水後赴台，逝世後報界譽之為堅毅報人，龐樸（曾迭）也沒有落水，吳漢和楊晉豪落水則為事實。

⑤ 楊帆：「上海孤島時期的黨和文藝界」，《上海孤島文學回憶錄》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編，第19頁。

⑥ 盧豫東在「孤島文學的輕騎」中認為在初期孤島文藝中，是雜文當了前哨。

⑦ 上世紀80年代王任叔尚有《魯迅風憶舊》，其中的認識與此前未有變化。

⑧ 「我們對於魯迅風雜文問題的意見」，《華美晨報》1938-12-28。

與魯迅雜文有程度之差，“流行的短評，一般祇停止於社會現象的一般批評，而沒有做到社會現象之本質的把握和發掘”，“大都是資產階級意識的表白”，“缺少堅強的思想性，思想的正確性”，“祇有把時行的短評，提高到魯迅式的雜文，而不應該就把時行的短評，來代替魯迅式的雜文。”^①王任叔在這裡清楚地表示在思想性上，“魯迅風”雜文是優於時評的，因而也具有了不可替代性。客觀而言，報紙的短評與魯迅雜文本無可比性，但在抗戰救亡的時代背景下，王任叔等“魯迅風”雜文因在論述對象和內容上與短評存在不少的交叉，換句話說，王任叔等“魯迅風”雜文作家並非僅限於文藝和文化問題，而是多指涉社會政治問題，因此，將二者並列比較也易於理解。但問題是，“流行的短評”是“缺少堅強的思想性，思想的正確性”嗎？又如何對“社會現象之本質的把握和發掘”呢？當龐樸反問王任叔的“意識夠正確嗎”^②的時候，其實點中了王任叔觀點的要害。如果在思想觀念、文化立場和政治態度乃至行文風格，與戰時動員體制要求之間存在差異甚至衝突，人們還能認為自己的“意識夠正確嗎”？

舉例來說，滬上報端常有學校改組內幕揭發等教育新聞的刊佈，情況真假參半。淞滬會戰結束後的1938年3月，出現偽大道政府暗中推動私立中小學校登記的佈告。若某學校向偽大道政府登記接受教育津貼，該校學生即不被國民政府教育當局承認，造成學生和家長惶恐。面對紛詭的傳言，潘公展遙控的上海教育系統人員以筆名黑在『華美晨報』發表「告訴你教育界的內幕」，表示教育界確有動搖和附逆情況，但教育界已有堅強組織並出現團結局面。對於報端的所謂揭發信，認為實有同行傾軋和學生報復及別有用心者破壞教育界統一戰線的嫌疑。王任叔看罷以羿矢筆名在『文匯報·世紀風』發表「黑的戰術」。文章將被揭發的校長稱之為丘九，他們欺上迷下，開除愛國學生，最後還形成“聯合陣線”，並斷言署名“黑”的記者不是被人利用，便是“抹黑了良心來說話”。客觀而言，孤島初期大批難民湧入租界，滬上受社會局和教育局津貼的中小學普遍能堅持民族立場，附逆情況極少，就連日偽情報部門也承認滬上教育界仍受潘公展控制，因而孤島初期的教育界主流是好的，倒是由於租界難民的激增，各類私立學校大量增加，相互競爭導致相互抹黑的事件層出不窮，常有澄清闢謠消息見諸報紙教育欄，而王任叔的打擊面不但包括了確有不端行為之學校，還對可能的“動搖”學校，甚至對“存疑”學校施行攻擊。這種“擴大化”的攻擊很難說是“顧全大局”，更不利於國民黨教育當局爭取處於“搖擺”中的個別學校。從社會效果和大局出發，王任叔的文章無疑存在龐樸所謂的“意識夠正確嗎”的問題。

再如王任叔的「謹防扒手」，此文其實是由天主教聞人陸伯鴻被暗殺引發，^③原因是陸有親日嫌疑，其與榮宗敬等籌組的上海市民協會是與日合作的偽組織。面對陸的被暗殺，王任叔的態度是“大概沒有誰會惋惜”，而且暗示“所以實幹的精神，是緊要的，合法不合法，有時候盡可不必拘泥”。王任叔沒有慮及陸伯鴻僅僅是因為“嫌疑”或有落水的可能就被暗殺，但上海對陸之被暗殺實際上頗有爭議，至少天主教方面是“惋惜”的，且陸的被殺導致其畢生支持的龐大慈善事業難以維繼，這後果王任叔並不曾想到。^④從社會效果而言，似乎又可以印證龐樸所謂“意識夠正確嗎”的問題。此外，如「真理的被擊」和「卻說逃難」，恐怕難免有比喻不當及故作驚人之論的問題。除了王任叔，其他作者也多少存在此類問題。如文載道在「自由萬歲」中說：“自由是無限度的，無背景的，凡是真正的自由，也無不合理且合法，所謂神聖不可侵犯，正是自由的真諦。”這完全是對自由的歪曲。再如孔另境在「就義種種」中想到日軍的虐殺俘虜，認為：“我實在不能同情這位被殺者，這種任人宰殺的姿態實在是我們民族的恥辱”，“連牛馬都不如，真可謂洩氣之至了”。孔另境之意是希望見到俘虜的反抗，這未免太過“書生之論”了。諸如此類的“意識”問題，在魯迅風雜文群中並不鮮見。^⑤

客觀而言，“魯迅風”雜文流行各大報端，數量極多且大體並無問題，它們針對的主要還是

① 巴人：『論魯迅的雜文』（上海：遠東書店，1940），第105頁。

② 龐樸：「圍剿的總答覆 六最後致巴人先生書」，『華美晨報·鍍金城』1938-12-18。

③ 陸伯鴻為中華全國公教進行會總會長、慈善家，1937年12月30日被暗殺。

④ 陸伯鴻被暗殺眾說紛紛，但戰後宋美齡曾慰問陸之親屬，似乎有為陸正名之意。

⑤ 本段舉例的雜文均出自『邊鼓集』（上海：英商文化出版公司，1938）。

法西斯侵略者和附逆份子，起到的作用應予以充分肯定。但也應說明的是，以王任叔為代表的魯迅風雜文群體是以極其激進的姿態看待包括文藝在內的社會現象並對之進行“語不驚人死不休”式的批評，其中既有五四啟蒙式的思維，也有魯迅語體和風格的簡單嫁接和模仿，思想深度和文章技巧并未達到魯迅雜文的水平。就“魯迅風”雜文群寫作的實際來看，王任叔群體理應接受阿英、楊晉豪甚至龐樸的批評，但現實是王任叔認為統一戰線“是矛盾的統一過程”，“在民族的觀點上是統一的，在階級的觀點上是矛盾的”，基於此，王任叔繼而認為“一聽到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就以為不如做自己的奴隸，於是對貪官汙吏，不敢置一詞，對頑固反民主份子，不願進一言，這現象現在正在發展著，而狂妄之徒，利用民眾的為國家為民族的委曲求全之心，竟借國家民族為幌子，大施高壓手段。這於抗戰是斷然無利的”。這表明，在統一戰線中，王任叔堅持對內部矛盾可以持批評態度。再對比座談會的「聲明」：

我們相信，魯迅的雜文的幽默諷刺風格，在現在，甚至在將來，只要社會的革命鬥爭繼續存在，仍然有偉大的價值。在抗戰的現階段中，**如果我們真有魯迅的幽默諷刺風格，來揭發敵人或漢奸的陰謀醜態，或打擊那些對抗戰幻滅動搖的份子，都是有益的，正確的。**

這裡的“敵人”是指日偽，漢奸無疑包括了托派，動搖分子則指向了可能的漢奸，這指明了雜文寫作的目標，同時也暗示雜文作者應該規避什麼。換句話說，雜文需要批判的是在抗戰中的敵人，而不應在統一戰線內部，不應針對戰友和廣大民眾。這也是杜埃在「魯迅式雜文之再建」中指出的那樣：“今天的諷刺對象有了轉變，諷刺的原則有了新的根據。我們所要無情地加以諷刺的，不是同一戰線的友黨友軍，而是戰線之外的敵人和障礙物。”^①其實在1937至1938年間，戰時文學的要求在作家中還是頗具共識的，王平陵在「戰時文學家的責任」中如此表述：

作家們對一般盲盲然的大眾不僅是刺激他們的感情，而是要加強他們對現實的認識；不必要儘量暴露他們的弱點，使他們感覺失望，疲頹，缺乏迎接大時代的勇氣，而是要鼓勵他們奮發向上從痛苦中掙扎出來，加強他們對現實有反抗的實力，不必要在彷徨摸索之中佈置恐懼懷疑的場景而要把他們遲疑的腳步用力推送前進，把一切的勝利從魔鬼的掌握中取過來當她們還不曾發覺有暗礁橫梗著進程而在瞎眼亂闖時，作家們就得要像站在十字路口的巡警們指揮警鞭似的，突然高舉你的警鞭，警告大眾止步，指示他們轉換到光明的大道上去。^②

王平陵此處發言觸及到一個戰時文化統制的問題。也即在戰爭狀況下，新聞和輿論勢必應受到管制。文藝宣傳也應從抗戰大局出發，不能引發和散播民眾消極頹敗之情緒。這裡的責任人不僅僅是文藝作者，而且包括了副刊編者。而早在戰前的1937年3月，邵力子就代表國民黨中央黨部在上海召集新聞界座談會，主張在國家內憂外患之際，須打破“有聞必錄”的信條，“對副刊之選材，亦應於言論之撰述，新聞之記錄，加以同樣之注意”^③。這表明，國民政府在戰前已經對新聞界進行了初步的政治動員。抗戰軍興，國民黨中宣部再次給滬上各報以“快郵代電”方式發佈指導文字一篇，令上海各報紙副刊須按照指導行事：

為了要應付目前偉大的時代，舊有的副刊的內容自然是不合適的，事實上副刊的本身便須有一番急切的改革。至於其改革的步驟，消極的約為：

- (一) 肅清一切頹廢，淫靡，虛矯，厚誇，以及各種不切實的作品。
- (二) 絕對避免那般空洞無物，**意識不正確的文字刊載。**

積極的則為：

- (一) 採集中外英勇衛國的事實，鼓舞全國人民造成一種**樂觀進取**的健全心理。
- (二) 應儘量刊載**民族英雄之悲壯史跡**。介紹全世界各國求民族獨立解放之偉大文

① 杜埃：「魯迅式雜文之再建」，《大公報·文協》（香港）1939-5-2。

② 王平陵：『戰時文學論』（上海：上海雜誌公司，1938），第21~22頁。

③ 見『申報』1937-3-14，第9版。

藝運動。

(三) 文字力求誠懇簡潔，避免俗套類於空疏口號式的宣傳。

(四) 對於有功勳的前方將士，應極力介紹刊載，以便強調前方抗戰之士氣。

(五) 對於救護，防空，交通等知識，應極力以通俗的文字，儘量刊載介紹，使民眾有充分的準備。

(六) 對於侵佔區的民眾，應負教導鼓舞其奮起為民族抗戰堅強的後備為原則。^①

由以上指導意見可知，龐樸所質疑魯迅風雜文的所謂“意識”問題，實際與國民政府對滬上報紙輿論（包括了副刊言論）的要求有重合，也符合原上海新聞檢查所被日偽強佔後處於統制真空狀況下的言論指導意見。^②

不難看出，“魯迅風”雜文論戰表面是對刻意模仿魯迅雜文的不滿，實質是不同群體基於思想觀念、文化立場、政治態度對魯迅雜文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看法差異，亦即在抗戰背景下，魯迅雜文的那種尖銳的國民性批判、啟蒙立場和不妥協的對抗姿態，是否適用於基於民族立場的統一戰線環境，是否符合戰時文化統制的要求。如果不適應，那麼學習魯迅、繼承魯迅精神，也只能抽象地高舉魯迅不妥協的鬥爭精神這一點了。滬上的這場論戰，似乎並不局限在孤島。也許魯迅雜文及其所包含的批判精神，在民族生死存亡的處境面前，在不少人眼里，並非是文化工作者亟需迫切保留和繼承的精神財富。

四 統一戰線的分化與孤島文藝走勢

魯迅風論戰之後，出於對座談會集體意見的不滿，王任叔等雜文家創辦『魯迅風』半月刊以示抗爭，加上原有的『文匯報·世紀風』，魯迅風雜文群體的陣容似乎依舊整齊強大。但不得不承認的是，『魯迅風』半月刊的創辦標誌著孤島文藝界統一戰線的一次公開分裂。此處緣由應從抗戰爆發前開始說起。

1937年1月，面對兩個口號論戰後文化界出現的混亂局面，國民黨CC系潘公展出於統戰需要，不失時機地成立了包括郭沫若、田漢、茅盾、鄭振鐸、傅東華等左中右三方人士的中國文藝協會。淞滬會戰爆發後，協會擴大改組為上海市文藝界救亡協會，雖然還是包括了三方面人士，但主幹和實際控制者依舊是CC系人馬，如潘公展系下的吳漢即為協會秘書。但上海淪為孤島後，租界當局奉行中立原則，取締政治團體，禁止政治活動，統一戰線組織公開活動變得非常困難，加之本身的號召力組織力都不強，因此中國文藝協會在組織動員上是相當鬆散的。^③隨著滬戰的結束和孤島形勢的趨緩，文藝界的離散聚合也穩定下來，左翼人士開始大量加入協會，成為孤島統一戰線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此後，“魯迅風”論戰得以在CC系吳漢主持的『華美晨報·鍍金城』與王任叔、柯靈聚集的『文匯報·世紀風』之間展開。影響所及，反方擁有後援『大晚報·剪影』、『大美報·早茶』、『社會日報』等，而正方則擁有『魯迅風』半月刊、『每日譯報』、『譯報週刊』、『華美週刊』等，不難看出，這種隱然有別的陣營已然形成。

“魯迅風”論戰後不久，發生了王任叔和樓適夷與周楞伽的關於“反個人主義鬥爭”的論爭。王任叔將“第三種人”和托派帽子扣在周楞伽頭上，引發統一戰線內部鬥爭的加劇，以至在孤島負有政治使命的朱雯、舒湮等公開討論“新階段的文藝界統一戰線問題”，徐訏的表態最為直接：“應當大家掃除自己派別的成見，停止組織統一戰線內的小黨派”，“因私人嫌隙，向自己的人們侮衊造謠，應當停止”，“因個人的虛榮或權力，排斥別人的參加，應當糾正”，“容納多數的意見，成立民治的集團，在枝節問題上應當坦誠布公，討論切磋，不應當以謾罵的態度互相攻擊”。^④面對孤島文藝界的內訌，早在1939年初左翼陣營就基本持公開承認的態度：“上

① 歐陽械（張若谷）：「論副刊的性質」，《中美日報》1939-11-16。

② 戰時言論統制這一常識性問題在當時報刊上多有論及，尤其多舉英法等國為例，王任叔對此不會不知。

③ 中國文藝協會的最後一次公開會議活動是在1937年10月24日（見『民報』1937年10月25日），此次會議成立了戰時特別委員會，潘公展、郭沫若、傅東華、曾迭等都參與其事，而此時淞滬會戰我方陷於被動，10多天後我方開始撤退，因此孤島文藝界統一戰線組織就是以CC系潘公展控制的上海文教界為基礎的。

④ 「新階段的文藝界統一戰線問題」，《東南風》1, 2 (1930)：20-21。

海文藝界統一戰線始終只是一種號召，尚未形成事實”，“上海文藝界同人對統一戰線的理解不夠徹底，文藝人的劣根性未盡掃除。在理論原則上，大家都懂得統一戰線的價值與必要，但在這原則的具體運用上，在工作的實踐中，卻往往有意無意，或多或少犯了關門主義或宗派主義的錯誤。”^①可以說，左翼的警示並未奏效，且這種內訌在進入1939年後愈演愈烈。

孤島文學的存在，依託的是蓬勃興起的報刊新聞出版業，但汪精衛“和平運動”由港抵滬後的1939年中，“洋旗報”的黃金時期結束，一些在市民中有廣泛影響的日報如『文匯報』『每日譯報』『導報』遭處罰後停刊，『大美晚報』、『華美晚報』、『大英夜報』、『大晚報』、『申報』等都遭遇經營困難，文藝版面或取消或縮版，這直接導致孤島文藝生產難以為繼，導致統一戰線內文藝工作者的重新洗牌。而在此之前的1938年11月，國民黨中宣部鑒於上海的重要地位和報業無序競爭導致無法有效傳達中央意見的狀況，設立了黨報性質的大型日報『中美日報』，這不但標誌著國民黨中央開始加強管控孤島輿論，同時副刊『集納』的設置也意味着國民黨中央對孤島文藝開始施加影響。

更為重要的影響來自於重慶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及其後制定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這導致上海孤島新聞界開始系統排斥左翼文化人，如『申報』排斥了有左翼傾向的胡仲持，此前更有王任叔的離職。『每日譯報』是左翼集中度最高的報紙，在1939年5月18日遭租界當局停刊三週處分後，因左翼過於集中的原因，總編輯錢納水索性不再復刊。『導報』與此同時也永久停刊，而任職其中的惲逸群雖有社論精警的讚譽但也不得不另謀出路。『文匯報』的柯靈，雖在停刊後需要再尋東家，但因有東南戰區宣傳員的身份，順利入職『大美報』。大美系^②的袁殊、劉祖澄（魯風）、惲逸群，華美系的梅益等也都在1940年前後或離開報界，或遠走皖南。其他如于伶早已選擇投身戲劇運動，姜椿芳等則託庇蘇聯領事館，可以說，原先在新聞業供職的左翼文化人基本遭到清理。這一過程，有的是不歡而散，有的是因報紙的停刊順勢而為，但不可否認，“魯迅風”論戰導致的统一战线分裂加速了這一過程。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左右翼的分道揚鑣也有中共淪陷區文化戰略調整的因素，這其中袁殊系統可堪代表。到1940年後，孤島左翼擁有的文化陣地僅剩『上海週報』和『學習』兩個定期刊物。^③國民黨方面則擁有兩份黨報『中美日報』和『正言報』^④下屬的多個文藝副刊，定期刊物則有『中美週刊』和『正言文藝月刊』等，可以說，到孤島中期，左右翼的實力對比拉大了。

『魯迅風』雖然持續了雜文寫作，但衰落的走勢相當明顯，這不僅是因為寫作陣地的喪失和租界當局的管控，還因為“魯迅風”雜文群體內部因“反個人主義論爭”後出現的分化。但與此對應的是，另一類雜文或稱之為文藝短評的文字在『中美日報·集納』出現，這即是編輯張若谷的雜文寫作，這類雜文風格平實，語言雅潔，戰鬥鋒芒不減，可堪孤島中後期雜文寫作的代表。相對雜文寫作，孤島戲劇運動則顯得更為蓬勃，吸引了大批左右文化人投身其間，這大概也是促使“魯迅風”雜文寫作整體衰落的原因之一。

五 “重振雜文”與“保衛魯迅”

1939年3月末，文協留港會員通訊處也即文協香港分會成立，當年5月2日，機關刊物『文協』在『大公報』首次發刊。在第1期中，杜埃發出“魯迅式雜文之再建”的號召。作者首先澄清了一個似是而非的判斷，即“諷刺的時代已經過去”。杜埃認為時代的演進導致原先的諷刺對象不在，但並非就此認為需要針砭的對象的消失，“我們所要無情地加以諷刺的，不是同一戰線的友黨友軍，而是戰線之外的敵人和障礙物”。配合杜埃的還有「關於諷刺」一文，作者黃繩坦言一些作家為避免落入“公式主義”和“抗戰八股”的窠臼，走上了諷刺之路，但“鋒刺的不

① 應服群：「一年來的上海文藝界」，『譯報週刊』1，12-13（1939）：318-319。

② 大美系是指『大美晚報』和『大美報』，主責人是張似旭和吳中一，吳中一為潘公展CC系骨幹。

③ 上述兩個刊物均從1939年延續至1941年末，較有影響。其他短暫存在的刊物報刊有『中學生活』、『青年知識』、『職業生活』等，受眾多為青年學生。

④ 『正言報』（1940年9月20日—1941年12月8日）係三青團吳紹澍創辦，為重慶當局的第二份黨報。

夠，便等於迴避敵人”，因而“諷刺作家要加緊學習”。^①兩文論調持平中正，幾乎不能在香港稍起波瀾。不過在孤島，反引起王任叔等雜文家的回應。1940年1月13日，王任叔在出刊不久的『大美報·淺草』上發出“重振雜文”的倡議，並呼籲“我們轉來擁護杜埃先生的建議吧”。但事實上王任叔並未絕對認可杜埃的看法，他忽略了杜埃認為諷刺的對象在“統一戰線之外”，反提出“目前是忠與奸，漢與賊，封建勢力與民主勢力，提到更高的尖銳對立的階段”。^②似乎表明王任叔的諷刺對象比杜埃要大。事實上王任叔確也遭到來自不同陣營的批評。如居於孤島新聞業領導地位的『中美日報』其副刊『集納』，從1938年12月13日開始至1939年7月，至少有兩篇文章或明或暗嘲弄了魯迅風式雜文，其中一篇甚至點名批評王任叔的「臉譜主義者」“其措辭之毒辣及尖刻，決非尋常人所能想到”，甚至警告此類作者，在孤島的惡劣環境中，統一戰線可能會“分化猜忌乃是自取滅亡”。^③很明顯，『集納』的編者張若谷是站在孤島文藝統一戰線的領導地位發言的，而文章的作者歐陽械，其實不過是張若谷的化名。批評還不止於內部，1939年8月創刊的汪派刊物『國風』刊登了一篇「魯迅論」，對源自延安的魯迅“聖人”論不以為然，大加謾罵。而汪偽『南京新報』也對結束不久的“魯迅風”論戰多加譏諷：“所謂躲在租界上捐洋商招牌的抗日報紙，原無非這麼無聊的在湊熱鬧，紅葡萄們在敲鑼打鼓自吹自擂而已”。^④這樣一來，王任叔鬥爭對象的擴大化實際包括了自來日偽和國民黨黨報系統，具體是指『中美日報·集納』的編者張若谷。孤島在進入到1939年5月後，幾乎任何論戰性質的話題都不僅僅局限在左右之爭，而是至少包括了三方面勢力的博弈，也就是說觀察雜文和魯迅話題，都要將日偽的相關表述考慮在內，“重振雜文”也應作如是觀。

對“重振雜文”做出迅速回應的是白鶴（孔另境）、列車（陸象賢）、辯微（周木齋）、遊青等，刊物主要包括了柯靈編輯的『正言報·草原』及王任叔編輯的『上海週報』及1941年出現的6期『雜文叢刊』^⑤。此時的雜文所涉內容偏重時政，態度也更趨偏激，如關於雜文是否應該“人身攻擊”的爭論顯然局限在初涉文壇的文艺青年中，毫无深度可言。但不可忽視的是，汪系報刊亦對“重振雜文”表現出興趣。『京報』副刊就刊有署名紅樹的「重振雜文」，而『南京新報』竟也迅速回應，刊出若湜的「讀紅樹的重振雜文」。這兩篇文章在學理探討上毫無新意，只是在有意無意述及魯迅及魯迅雜文遭打壓的歷史，暗示重慶當局對文藝的摧殘。在戰時狀況下，通過紀念魯迅或談魯迅雜文而間接表現重慶國民黨當局統治的反動性是汪偽文宣系統的慣用手法，意在挑撥統一戰線中的左右兩派。

汪偽系統對魯迅和魯迅雜文似是而非的論述，關鍵目的還是對重慶當局進行文宣對抗。其中最積極的是汪偽機關報『中華日報』，對國民黨孤島黨報『中美日報』副刊編輯張若谷大肆攻擊和嘲弄。作為30年代民族主義文藝運動骨幹的張若谷，主編孤島時期『中美日報』文藝副刊『集納』，實際上肩負著組織動員文藝青年從事文藝抗戰的使命。作為編者，張若谷儼然是國民黨孤島文藝的代言人。為動員孤島文藝青年從事抗戰文藝的寫作，張若谷於1940年6月11日起在『集納』上連載「十五年寫作經」50期。在評價魯迅時，張若谷再次搬出其30年代評價魯迅的舊文，即所謂“紹興師爺”論，立即引起『中華日報』的嘲弄，如殷德先「讀了十五年寫作經驗」^⑥和徐冠宇「活張若谷仍在曲解死魯迅」^⑦兩文，都對張若谷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中美日報』與『中華日報』對壘自然是重慶國民政府與汪偽鬥爭在文化戰線上的反映。另一方面，“紹興師爺”論也遭到來自左翼陣營的更大打擊。王任叔的『論魯迅的雜文』洋洋五萬字，開首結尾無不拎出張若谷加以譏諷，甚至認為張若谷在理解魯迅上不如『中華日報』的所謂文奸。這種“示眾”般的批評，激起張若谷連續5天在『集納』上刊發「我與魯迅」，指責王任叔與『中華日

① 以上兩文見『大公報』（香港）1939-5-2。

② 毀堂（王任叔）：「重振雜文」，『大美報·淺草』1940-01-13。

③ 歐陽械：「論寫稿」，『中美日報·集納』1939-7-12、13。

④ 雲：「關於魯迅風」，『南京新報』1939-01-7。

⑤ 北社1941年出版4本雜文集，均為早先雜文的結集。

⑥ 見『中華日報·華風』1940-6-27。

⑦ 見『中華日報·小採集』1940-7-12。

報』一起圍攻，是“分裂統一戰線”。張若谷居高臨下“扣帽子”，激起左翼陣營在『上海週報』就連續發文批判。客觀而言，張若谷擔負組織孤島文藝的重責，本應處理好與統一戰線內部的各種關係，卻與王任叔激戰，與小型報人陳靈犀等論爭，言詞過激，無疑妨礙了對文藝界的統戰。而左翼陣營一遇批評，即群起而攻之，“空造左翼橫暴的幻影”^①，也不利於團結。如此一來，“重振雜文”自然難以開展，就連魯迅紀念活動本身都出現矛盾。

1939年10月魯迅逝世三周年之際，日軍駐滬報導部機關報『新申報』加入到闡釋魯迅的行列。疇人的「從高爾基的生平說到魯迅先生的一生」是日軍文宣部門利用魯迅的開始。疇人打著“紀念魯迅”的旗號，呼籲將魯迅遺教“永遠埋藏在全世界愛好和平與自由的人民的心底”^②，這似乎是隱晦地為所謂“和平運動”張目。無獨有偶，同一天『中華日報』刊發了早立的「紀念魯迅先生」^③一文，認為魯迅並非左派共產作家，相反是反共作家。兩份日偽機關報同期紀念魯迅，標誌著日本報導部和汪精衛系統在利用魯迅上基本有了一致看法，即希望將魯迅塑造成所謂的“日本友人”和“主張親善的前進作家”^④。在日偽紀念魯迅過程中，內山完造的紀念文章別具特點。「紀念魯迅先生」是為『華文大阪每日』1940年新年號所寫，文章將魯迅描述成一個被壓迫者，認為魯迅“是一位執筆統率著民眾的革命實戰的偉人，直至臨終時且抗拒著同鄉蔣介石而不投降的那種意氣，才是中國青年應該學習的呢！”^⑤內山完造巧妙地將紀念魯迅引導到反蔣上，這也許是內山的真心話，但在戰時則具有了鮮明的文化政治的意味。在日偽刊物『中國月刊』上，內山完造又說：“魯迅在出廣東中山大學時，即表明與蔣介石對立態度”，“蔣介石是浙東派，魯迅亦是浙東派，同志又同鄉，但是魯迅至死還是絕對固執地反蔣反國民黨”。^⑥內山完造對魯迅的闡釋與其後報章上不時出現的關於魯迅與內山並提的掌故文章，一起強化了內山完造作為魯迅知己的魯迅論，從而有效呼應了日偽戰時反蔣反重慶的戰略目的。^⑦如果說內山的魯迅論是反蔣，那麼其他的日本論述者如山本實彥、長與善郎、室伏高信等對魯迅的各類回憶，不過是或多或少似是而非地營造出“日本友人”的印象。可以說，日偽集團“和平運動”開展後的1939年，紀念魯迅成為日汪展開文化運動的一個抓手，而淪陷區上海紀念魯迅的內涵則開始變形走樣。

針對日漸荒腔走板的魯迅論，左翼群體喊出了“保衛魯迅”的口號。在『學習』半月刊1940年7月組織的『魯迅六十誕辰紀念特輯』中，辛石直言“在這裡我們會發見魯迅先生逝世以來的一個日漸濃厚起來的事實，便是因為魯迅先生已經死了，許多在先生生前被視作恨的物件，始終不肯寬容，與之妥協的人們，同時也把魯迅先生當作仇敵，予以訕笑，予以迫害的人們，也在變成魯迅的信徒，魯迅的朋友，魯迅的愛護者了。”這段針對的是『中美日報·集納』的編者張若谷。“而現在正自以為懷著騎士般的精神，在替世界與祖國剷除著某種禍害，而其實並不像騎士般低首于美人之前，倒是屈膝在猙獰的喋血獸之前的人，也在歌頌魯迅的偉大了。”^⑧這裡指的是倒向日汪的文人，針對的是『新申報』和『中華日報』。“保衛魯迅”口號的提出，顯示出左翼知識份子防止魯迅形象和闡釋權被篡奪的努力，故而在這期特輯中，包括魯迅家屬在內的許廣平、周建人及部分左翼知識份子共撰寫了8篇紀念文章，涉及魯迅的鬥爭品格、魯迅雜文等不同方面，顯示了捍衛魯迅的決心。此後的魯迅逝世四周年、五周年紀念日中，『學習』、『上海週報』及柯靈編輯的『正言報·草原』中，都表現出對各種不同於左翼敘事的魯迅論的批判，用周木齋的話來說，即“魯迅先生是抗戰的象徵，是中國革命的象徵”，“紀念魯迅先生是我們的示

① 毀堂（王任叔），「風氣的校正與改革」，『文藝新潮』2，1（1939）：1-2。

② 見『新申報』1939-10-19。

③ 見『中華日報』1939-10-19。

④ 莫舍：「蓋棺不論定」，『京報』（南京）1940-11-13。

⑤ 內山完造：「回憶魯迅先生」，『華文大阪每日』4，1（1940）：48-49。

⑥ 內山完造：「憶魯迅」，『中國月刊』7，1（1941）：40-42。

⑦ 有論者認為內山完造無愧魯迅知己，其文字無助於所謂的「親日」宣傳，此言也許有道理，但若深入歷史現場，那內山魯迅論中的反蔣論調，無疑和日汪系統中各類蔣介石論并无太大差別。

⑧ 辛石：「保衛魯迅」，『學習』2，9（1940）：194-195。

威”。^①如果說紀念魯迅近乎是一場文化鬥爭，那麼“重振雜文”也將必然帶有鬥爭品格，只是孤島中後期的雜文更具內部鬥爭的特點，如『雜文叢刊』中，鬥爭鋒芒直指國民黨黨報『中美日報』、『正言報』等相關表述，具體包括了國民參政會的黨派問題、重慶的物價問題、實施憲政問題、國共摩擦問題等等，故而孤島國民黨地下文宣系統不斷對此類刊物進行批判，雜文文體在此過程中自然不免會染上黨爭色彩，而雜文難以呈現出“重振”之勢也就易於理解了。

六 結語

在不長的四年孤島時期，四次魯迅逝世紀念和一次魯迅誕辰紀念本可將魯迅作為“精神抵抗”的資源善加利用，但在統一戰線分化甚至內鬥的情況下，不僅魯迅紀念寥落，甚至魯迅形象本身也在日偽的強制闡釋下出現歧義。當然，這也是由於魯迅本身的複雜性，各派政治勢力從魯迅言行中斷章取義，各取所需導致的。魯迅生前有言在先，“毀或無妨，譽倒可怕”^②，在左翼的一輪輪闡釋下，魯迅由文學魯迅變為“聖人魯迅”，添加政治油彩的塗抹無助於抵抗精神的生成。反倒是1942年上海全面淪陷之後，汪系開始系統紀念魯迅之時，身陷其中的文化人用“惟有沉默力行，始為紀念周氏最佳之表示也”^③以示反抗。沉默者有之，但紀念者亦不少。有論者所言，汪系機關報『中華日報』每在魯迅逝世紀念中出特刊，態度“積極昂揚”。確實如此，編者楊之華^④曾在『紀念魯迅特輯』導言中表示之前的所謂紀念，“不是流於如何如何崇拜魯迅，敬仰魯迅……之類的八股式論調，便是曲解魯迅先生的言論，抹殺其一生正大的言行……我們今日紀念魯迅先生，便不能不要客觀地指出先生的言行及其偉大之處”。^⑤雖然楊之華歪曲內山完造『活中國的姿態』中的魯迅序，來為附逆提供理據：“據我看來，日本和中國的人們之間，是一定會有互相瞭解的時候的。如今便是中日兩大民族由互相瞭解進而攜手合作共保東亞的時候了。”^⑥也許，這是楊之華敷衍新聞檢查的擋箭牌，反觀特輯中的具體文字，還真是“謬托知己”般的將魯迅還原成了“文學魯迅”和“人間魯迅”，這不能不令人錯愕。不過抗戰末期，這種汪偽體制內文化人還原魯迅的做法，並不為日本方面所嘉許，從“協力”大東亞戰爭的立場出發，日本方面提出“回到魯迅再出發”，但受到汪系文化人的抵制和反擊^⑦。在淪陷上海紀念魯迅中，還有一副奇景，即“興建系”^⑧文人在紀念魯迅中試圖借助魯迅來“自我療救”，緩解委身事敵帶來的精神和道德危機。^⑨抗戰勝利後，肅奸運動聲中，崔妨控訴文奸們“在述說魯迅和自己如何如何之中，隱隱把這位巨人寫成像他們自己一樣的一名大東亞文學者，而有人還惋惜魯迅之少寫小說，多寫雜文。這些筆下惡業，具載於他們的紀念魯迅專輯中，其實連一點韌性也不具的文人，又那裡配紀念魯迅？”^⑩其實這裡所謂的“筆下惡業”不過就是應景的八股，而整個上海淪陷時期，報刊雜誌不過將魯迅消費於掌故和趣味之中而已，或者也如一些論者所言，是“庸俗化”了魯迅。

[責任編輯：廖媛苑]

① 辯微：「偉大的象徵」，『正言報·草原』1940-10-19。

② 魯迅：「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二心集』（上海：上海合眾書局，1932），第96～102頁。

③ 見『中國商報』，『國民新聞』1942-10-20。

④ 楊之華，廣東人，『中華日報』副刊編輯，有筆名何穆爾，編有『文壇史料』，著有『文藝論叢』。

⑤ 楊之華：「導言」，『中華日報·中華副刊』，1942-10-19。

⑥ 同上。

⑦ 陶晶孫、章克標、楊晉豪等都著文反對。

⑧ 興建系是指袁殊在滬依託日本駐滬領事館岩井英一開展的興亞建國運動後所形成的一個群體，最初包括陳孚木、張資平、袁殊等。后以袁殊為核心，聚集了魯風、哲非、黃峰等，創辦有『新中國報』、『雜誌』、『興建』、『政治月刊』、『新學生』等，後範圍擴大，還包括了吳江楓、王予、黃軍等。

⑨ 如若參照戰時北平的文壇狀況，魯迅話題另有一副奇景，即龜谷利一、柳龍光主導的華北作家協會部分青年作家言說魯迅帶有叫板所謂“老作家”周作人之意。

⑩ 崔妨：「回顧文化荒場」，『自由中國』創刊號（1945）：16。